

吉川英治《三国志》底本问题考究

——兼考《通俗三国志》的底本问题

○ 武 鹏¹, 高文汉²

(1. 山东大学(威海) 翻译学院, 山东 威海 264209;

2. 山东大学 外国语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 日本近代历史小说家吉川英治的《三国志》是《三国演义》的改写本。作者在基本人物与故事情节没有脱离原作的前提下,对人物进行了重新塑造,成为名副其实的“吉川版‘三国演义’”,本文一方面分析吉川英治《三国志》改写所据底本问题,另一方面对其底本——《三国演义》的日本初译本《通俗三国志》的底本问题也做相关考证。在此基础上,对相关论文进行指谬工作。

[关键词] 吉川《三国志》;《通俗三国志》;底本问题

吉川英治(1892-1962),原名英次,日本历史小说家,被誉为“国民作家”“日本大众文学第一人”。他的代表作品《三国志》从1939年8月开始在日本《中外商业新报》(现《日本经济新闻》)等四家报纸以及台湾的《日日新闻》上同时连载,直到1943年9月连载完毕。吉川英治要重新创作《三国演义》(下称《演义》),要对其进行改写或再创作,必须有可以依据的底本。吉川英治本身不懂汉文,无法直接阅读三国方面的原著,因此只能借助之前的译本进行创作。其实在底本选择的问题上,他曾经说过:“原著现存《通俗三国志》和《三国志演义》以及其他数种不同流变版本。笔者没有完全依据这些版本进行简单的直译,而是各取所长,从而形成了自成一格的《三国》。”^[1]这里提到的《通俗三国志》即《演义》的日文初译本——江户元禄年间的湖南文山译《通俗三国志》(下称文山译本),而《三国志演义》指的则是1912年出版的久保天随的《新译演义三国志》

作者简介:武鹏,山东大学(威海)翻译学院日语系讲师,山东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学、中日文学关系;高文汉,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学、中日文学关系。

(下称天随译本)。吉川《三国志》与文山译本关系的密切程度不言而喻。因此,要弄清吉川《三国志》改写所据底本问题,应先对文山译本所据的底本问题有所把握。如此可追根溯源,加深对《演义》在日本传播等问题的理解与认识。

一、《通俗三国志》底本探究

《通俗三国志》是《演义》的日本初译本,译者为京都天龙寺的义彻、月堂兄弟^[2]。两人署名湖南文山并于元禄二至五年间(1689-1692)刊行。这是继满语版的《演义》之后,问世的又一种译本。该译本改变了《演义》章回体的形式,将原有的一百二十回合并成五十卷,加强了故事情节的连续性。同时删去了几乎每回末尾必有的“且听下回分解”的评书套语,将作品由以听为接受方式的说唱故事完全改变成以读为接受方式的阅读小说,真正意义上实现了由说唱故事到读本^[3]的转换。^[3]《通俗三国志》出版后在日本迅速传播开来。据日本学者分析,这是因为“描写三国时代曹、刘、孙争雄征战的区域,几倍于日本的国土,豪俊并起,猛士如云,这是日本的军记物语望尘莫及的,而书中展现的给日本人以‘奇想天来’之感的权谋术数,令读者心惊胆寒,而描写的方法又多夸张之笔,写来笔墨纵横而又融贯缜密,其战况之‘壮快雄大’,读者不能不为之‘血涌肉跃’,拍案三叹”。^[4]

有关这个译本所据的《演义》底本问题,日本学者小川环树先生在其《中国小说史研究》一书中有过相关考证。考证的结果是文山译本依据的底本为《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具体考证方法是对一个误字使用的分析:京都的蓬左文库所藏李卓吾评本(下称李评本)第九十回中,对南蛮酋长兀突骨的妆容,描述为“头戴日月狼帽”。1893年出版的帝国文库版文山译本将其译成“頭に日月の狼帽をいただき”。然而,“ ”是一个连康熙字典都未收录的汉字,包括毛评本在内的其他版本均为“鬚”字,即“头戴日月狼鬚帽”。据此可以推断,该字为李评本使用的一个误字,而文山译本却如实沿用了这一误字。正是这一点成为判断文山译本所据底本的关键性依据。^[5]

李评本是上承夏振宇、周曰校本,下接毛宗岗批评本等版本,是《演义》流传版本中一个较为重要的版本,关于李评本的版本,目前存世的主要有六种:一是建阳吴观明本。此书现藏于日本蓬左文库、静嘉堂文库、北京大学图书馆残本。小川环树考证湖南文山译本所据底本即使用的该版本;二是刘君裕刻图简称“刘君裕本”。现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三是康熙年间吴郡绿荫堂刊简称“绿荫堂本”。此本现藏于北京市首都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日本宫内厅书陵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南京图书馆^[6]、法国国家图书馆;四是清初吴郡黎光楼·植槐堂刊简称“黎光楼本”,此书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天津图书馆残本、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残本、天理大学图书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五是雍正三年苏州三槐堂、三乐斋、三才堂刊简称“三槐堂本”。此书现藏于耶鲁大学;六是宝翰楼刊本。现藏于耶鲁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7]

笔者未曾见过京都蓬左文库所藏版本,因此,只能将文山译本与手头上的李评本进行比照阅读。读过之后发现,文山译本较李评本并无明显删减或增补的情节,无论是回目标题还是细节描写两者均无太大出入,从而基本认同了小川环树先生的观点。只是在此过程中,发现一个有必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湖南文山译本第一卷开篇写道:

总观国家之兴废,自古至今,治极之时则入乱,乱极之时则归治。此理同阴阳之消长寒暑之往来。故此,仁君则小心翼翼、兢兢业业,须臾莫敢忘焉。尧舜尚且病诸,况庸人乎。

汉之高祖,提三尺剑平秦之乱,至哀帝时天下已治二百余年。王莽乱政篡位,更有甚者海宇。之后光武平之,兴后汉之世,至质帝、桓帝时,已有二百年矣。^[8]

该段文字总结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并以史实为例进行说明,可以看作是小说的引子。这在毛评本中有类似的表述: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国分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分事,又并入于汉;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献帝,遂分为三国。^[9]

然而,李评本开篇却未见如此表述,而是直接进入主题:

后汉桓帝崩,灵帝即位,时年十二岁。^[10]

据考证,毛评本的成书时间在康熙五年(1665)前后^[11],而文山译本刊行于元禄二至五年(1689-1692)。从时间来看,后者存在借鉴前者的可能性。正如小川先生所言:“只要是1689年之前在中国出版的版本,任何一个都可能成为底本的。”^[12]由此,笔者认为可下两方面的结论:一、《通俗三国志》虽以李评本为底本翻译而成,然而这段开篇文字却非翻译自此;二、从文山译本与毛评本这段文字的相似性可推测,前者在翻译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后者或之前有类似开篇表述的版本,同时对《论语》(尧舜尚且病诸,况庸人乎)等汉籍也有一定程度的参考与借鉴。

二、吉川《三国志》底本考

明确了文山译本所据《演义》的底本问题后,现再来探讨、分析一下吉川《三国志》改写所据的底本问题。

如前所述,由于吉川英治不懂汉文,因此他只得借助日译本来完成小说的创作。即他提到的文山译本与天随译本。文山译本底本为李评本,天随译本底本为毛评本。因此,将吉川《三国志》与李评本、毛评本放在一起比照,所据底本问题会更加直观明了。

经过笔者细致比对阅读后发现,见于李评本而未见于毛评本的诸多情节或细节在吉川《三国志》中均有体现,而毛评本所独有的更改或细节在吉川《三国

志》中难觅踪迹。以下举几个三部作品对同一情节或细节描写的例子,以表格方式列出,以此分析吉川《三国志》创作时所据的底本问题。

《演义》第七回“孙坚跨江战刘表”中,孙坚拒绝其弟孙静勿起兵伐刘表的建议后有这样一段叙述:

从该段内容可以看出,李评本的描写较为细致,以父子对话形式呈现,而毛评本以叙述代替对话,表达相对简洁。吉川《三国志》在语言表达和情节叙述上则更接近李评本,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描写与刻画。

《演义》第八回“司徒王允说貂蝉”中,有关貂蝉的身世,三部作品都做了叙述:

在这段叙述中,李评本相较毛评本最大的不同是对貂蝉乐女身份的强调。吉川《三国志》则仍然选择在李评本的基础上进行改写。保留对貂蝉乐女身份的叙述,同时为方便日本读者更好理解小说内容,还特意对乐女身份解释了一番。

再举一例,同样出自第八回“凤仪亭布戏貂蝉”,吕布一早赶到董卓府上打探貂蝉消息,三部作品分别描述如下:

李评本以叙述的方式明确了吕布来董卓府的时间为午时,而毛评本未涉及时间问题。吉川《三国志》则以吕布自言自语的方式将时间表明。这说明即使在具体的时间表述等微小的细节处理上,吉川《三国志》仍然同于李评本。

如上例子文本中可谓多如牛毛,此处不再多做列举。另外,上文中提到,据小川环树先生考证,文山译本(1893年帝国文库本)所据底本为李评本(蓬左文库藏吴观明本)的关键性证据是两个版本对同一误字“ ”的使用,而其他版本皆为“鬚”字。笔者翻阅吉川《三国志》(1989年讲谈社文库本)时发现,文中对兀突骨的妆容描写为“白月の狼頭帽をいただき”(头戴白月狼头帽)。原作中的“日月”变成“白月”或许是吉川英治的笔误。考虑到报纸连载的紧迫性,将“日”字误看成“白”字可以理解,但是,对“頭”字的使用则说明吉川《三国志》改写底本是文山译本且极有可能就是帝国文库本。^[13]

由此得知,吉川《三国志》在创作时依据了文山译本(李评本)而舍弃了天随译本(毛评本)。如前所言,吉川英治在执笔写作时,会“情不自禁地闪现少年时代狂读久保天随先生的《新译演义三国志》,半夜三更犹猫在灯下不忍释手,被父亲责骂并逼着上床睡觉的情景”。然而,年少时的喜好并未左右他对底本问题的选择。改写《演义》伊始,两种译本或许均摆放在案头之上。经过一番思考后,他最终舍弃天随译本而选择文山译本。究其原因,笔者分析有两点:其一,文山译本成书在前且以日语文语翻译而成,天随译本成书在后,使用的是现代日语,两者相距二百余年。在对历史及文学原貌的反映上,吉川英治认为前者优于后者,更适合做改写小说的底本。其二,选择文山译本“身后”的李评本而舍弃天随译本“身后”的毛评本,是因为毛评本所体现出的强烈的“拥刘抑曹”的思想侧向。换言之,毛评本对曹操过度地贬低与丑化是吉川英治无法容忍的,或许他通过改写《演义》要现实的目的之一就是为“再评价”曹操或者说为其“平反”。虽然李评本也存在或多或少“拥刘抑曹”的描写,但其程度还是无法与毛评本相提并论。因此,他选择了在曹操问题上相对客观的文山译本即李评本为底本进行改写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相关研究资料的谬误分析

国内有关《通俗三国志》与吉川《三国志》的研究一直以来并未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不管是发表的研究论文还是出版的学术著作,数量上寥寥无几。对相关重要问题的研究更是浅尝辄止,未曾深入。因此,难以取得突破性的研究成果。正是由于总体研究的不成熟导致了对相关问题的认识上难免出现偏差或纰漏,底本问题既是如此。

鉴于此,在明确了《通俗三国志》的底本为李评本《演义》以及吉川《三国志》的底本为《通俗三国志》(帝国文库本)的基础上,笔者想对有关研究资料在底本问题上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与指正。具体分析四篇论文的相关问题。其中《通俗三国志》与吉川《三国志》各涉及两篇,分别是王丽娜、杜维沫于《明清小说

研究》(2006年第4期)上发表的《〈三国演义〉的外文译文》一文;沈伯俊先生于《社会科学研究》(1993年,第5期)上发表的《李笠翁批阅三国志简论》一文;王米娜发表在《北方文学》(2013年8月)上的题为“谈吉川英治《三国志》中的刘备形象”一文;谢立群、张永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1年第12期)上发表的《论吉川英治〈三国志〉对〈演义〉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一文。

先分析《通俗三国志》涉及到的前两篇文章。

王丽娜、杜维沫的《〈三国演义〉的外文译文》一文开篇写道:

《三国演义》的外文译文,有近二十个语种。其中最早的是湖南文山的日译本。这个译本出版于1689—1692年(清康熙28—31年,日本元禄2—5年),此时毛宗岗评“第一才子书”本已经问世,故各种外文翻译《三国演义》一般都依据毛本。^[14]

文中“各种外文翻译《三国演义》一般都依据毛本”的观点显然不正确。如上所言,文山译本的底本为李评本,对毛评本至多是借鉴而谈不上依据。毛评本虽然早于文山译本问世,但真正翻译毛评本的日文译本直至1912年才出版发行,即天随译本。

另一篇文章《李笠翁批阅三国志简论》中,沈伯俊先生认为李渔(即李笠翁)评改《演义》的底本为《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并阐述了五条理由,其中第三条为:

李卓吾评本和李渔评本的回目绝大部分相同,仅有14处略有不同,几乎都是个别文字的差异。如第9回回目上题,李贽评本作“王允授计诛董卓”,李渔评本作“王允定计诛董卓”,第14回回目下题,李贽评本作“吕布夜月夺徐州”,李渔评本作“吕布月夜夺徐州”;第37回回目下题,李贽评本作“玄德风雪请孔明”,李渔评本作“玄德风雪访孔明”。第113回回目上题差异稍大一点,李贽评本作“孙琳废吴主孙亮”,李渔评本则作“孙琳废主立孙休”(按:“孙琳”应作“孙綝”)总的说来,李渔评本沿袭李贽评本痕迹非常明显。^[15]

然而,笔者在翻阅文山译本时发现:文山译本的回目标题更接近李渔评本,“沈文”所列几处两者均相同,如第9回回目上题,李渔评本作“王允定计诛董卓”,文山译本则为“王允計を定めて董卓を誅す”(王允定计诛董卓);第24回回目下题,李渔评本作“吕布月夜夺徐州”,文山译本为“吕布月夜に徐州を奪う”(吕布月夜夺徐州);第37回回目下题,李渔评本作“玄德风雪访孔明”,文山译本为“玄德風雪に孔明を訪う”(玄德风雪访孔明)。此外,“沈文”所言“14处略有不同”的其他几处,文山译本也多同于李渔评本。如第47回回目下题,李评本作“庞统进献连环计”,李渔评本作“庞统诈献连环计”,文山译本为“龐統詐って連環の計を献ず”(庞统诈献连环计);第92回回目上题,李评本作“赵子龙大破魏真”,李渔评本作“赵子龙大破魏兵”,文山译本为“趙雲おおいに魏の兵を破る”(赵云大破魏兵);第104回回目上题,李评本作“孔明秋夜五丈原”,李

渔评本作“孔明秋风五丈原”，文山译本为“孔明秋風五丈原”（孔明秋风五丈原）。仅第113回回目上题，文山译本异与李渔评本而与李评本相同，为“孙綝废吴主孙亮”。可见，文山译本的回目标题与李渔评本更为接近。李渔评本的底本为李评本这一观点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公认，由于文山译本所据底本也是李评本，因此，李渔评本所据底本极有可能与文山译本的底本相同，即京都蓬左文库藏吴观明本。或者如日本学者中川谕先生在其著《〈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一书中指出的：李渔评本的底本为吴观明本与绿荫堂本之间的一个文本。^[16]总之，并非《〈李笠翁批阅三国志〉简论》一文中，沈伯俊先生拿来作比照的李评本。

再来看吉川《三国志》涉及到的后两篇文章。

先说王米娜“谈吉川英治《三国志》中的刘备形象”一文。“王文”通过三点分析吉川《三国志》在塑造刘备形象时与《演义》的不同，其中第三点“立体化的刘备形象”一节中写道：

吉川本的三国中刘备离开曹操后，曹操的谋士郭嘉进谏曹操被刘备蒙蔽，于是曹操派许褚带领人马去追赶刘备，刘备用计谋骗过了许褚，称郭嘉、程昱是因向自己索取贿赂未果而进谗言于曹操，许褚碍于关张二人无法下手，于是只得返回许都。而罗贯中的《演义》中刘备仅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而拒绝回京。这一情节的巧妙改写，使刘备和曹操的形象都发生了微妙变化。《演义》中的曹操多了几分奸猾，而吉川本的刘备则多了几分智谋。吉川英治对三顾茅庐的情节也增加了细节描述。如刘备请诸葛亮出山时说道：“在国势危乱、民无宁日之时，连孔子不也混迹于民众之中，周游天下，教化诸国吗？”刘备将诸葛亮与孔子相比，态度至诚，感动了诸葛亮。^[17]

然而，上述吉川《三国志》所谓的“改写”在李评本中均能找到。第一处李评本原文为“你回去，替我禀覆丞相：有程昱、郭嘉累问我取金帛，不曾相赠，因此于丞相前以谗言潜我，帮令汝来擒吾”^[18]。第二处李评本原文为“孔子尚游于诸国，而教化世人”^[19]。而且，上述两处细节亦见于文山译本。显然，该文在对比分析刘备形象时，依据的是毛评本而非李评本，并据此得出了“吉川本中的刘备则多了几分智谋”以及“刘备将诸葛亮与孔子相比，态度至诚，感动了诸葛亮”的错误结论。

再来看谢立群、张永“论吉川英治《三国志》对《演义》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一文。

“谢文”在分析吉川《三国志》中的关羽形象时写道：

另外，《演义》原著中提到关羽好读《春秋》，在吉川《三国志》中这一点体现得更加明显。例如，原著第二十六回“袁本初败兵折将 关云长挂印封金”中，张辽奉曹操的命令来试探关羽是否要离开。原著中并未交待关羽此刻正在干什么。而在吉川英治《三国志》的改写中，特别强调张辽拜访时关羽正在看书，而且看的正是《春秋》。并且针对《春秋》，关羽和张辽之间

还引发了一段议论。关羽说自己并不羡慕古人的管仲之交,因为自己和刘备同生共死的关系是管仲和鲍叔牙所无法相比的,并由此表明自己的去意已决。于是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了一个借古论今、通晓古典的关羽形象。^[20]

首先,“谢文”引用第二十六回的回目标题出自毛评本而非李评本。李评本为“云长延津诛文丑 关云长封金挂印”。其次,以上所谓“改写”俨然存在于李评本中:

关公正闷中,张辽入贺曰:“闻兄在阵上,知玄德音信,特来贺喜。”关公曰:“故主未见,何喜之有?”张辽曰:“公看《春秋》管、鲍之义,可得闻乎?”……关公曰:“昔日之言,安肯负之!文远须达其意,然后禀丞相。”^[21]

李评本虽未直言“张辽拜访时关羽正在看书,而且看的正是《春秋》”,但从张辽的问话中不难看出,关羽定是平日《春秋》不离手,且对其中典故了如指掌。因此,说吉川《三国志》与《演义》相比,展现给我们一个“借古论今、通晓古典的关羽形象”的确欠妥。

另外,“谢文”在论述曹操的风雅形象时写道:

吉川英治的《三国志》则在原著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曹操的诗歌文采。例如,原著第五十六回“曹操大宴铜雀台 孔明三气周公瑾”中,铜雀台建成,曹操大会文武,设宴庆贺。当武将们比过武、文官们献过诗之后,曹操也唤左右捧过笔砚,欲作《铜雀台诗》。这时突然有人来报:东吴使者表奏刘备为荆州牧,孙权以妹嫁与刘备,汉上九郡大半已属刘备。曹操闻之手脚慌乱,投笔于地。于是诗也没有写成。但吉川英治改写时于此处加上了两行诗:“吾レ高台二独步シテ兮、俯シテ万里ノ山河ヲ観ル”(吾独步高台兮、俯万里而观山河),并将情节改成曹操诗写到一半时才听到刘备占领荆州的报告。这加上的两行诗也就更凸显了曹操的文采。^[22]

这段描写包括曹操的两行诗句仍然出自李评本^[23],而非吉川英治独创。因此,文章得出的“这加上的两行诗也就更凸显了曹操的文采”的结论更是无从谈起。

综上所述,《通俗三国志》是以李评本为底本,并一定程度上参照了毛评本等版本翻译而成,而吉川《三国志》则以《通俗三国志》且极有可能是帝国文库本为底本创作完成。通过对相关论文资料的指谬与分析,笔者想给研究《通俗三国志》尤其是吉川《三国志》的各位同仁提个醒:吉川《三国志》依据底本为文山译本,而文山译本又是以李评本为底本。因此,在比较研究《演义》与吉川《三国志》的异同等问题时,通常情况下应以李评本为对照版本,而不应选择毛评本或其他版本。否则,以毛评本为对比版本分析吉川《三国志》的文本改写特色,得出的结论往往难以成立以致徒劳无果。

注释:

[1][日]吉川英治:《三国·桃园结义》,高培明译,重庆出版社,2011年,再版自序。

[2]关于译者的身份,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京都天龙寺义彻、月堂兄弟,两人花费三年时间协作翻译完成,并署名湖南文山发表;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翻译了《通俗汉楚军谈》的梦梅轩章峰与称好轩徽庵合作完成。日本学术界多倾向前者,此处笔者也选择认同前者。

[3]邱岭、吴芳龄:《〈三国演义〉在日本》,宁夏出版社,2006年,第57页。

[4]转引自王晓平:《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37页。

[5][11][12]参见小川环树:《中国小说史研究》,日本:岩波书店,1968年,第169-172、153-157、171页。

[6]石昌渝先生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一书未将南京图书馆藏本归入其中任何一种。福建师范大学刘海燕教授在其《明清〈三国志演义〉文本演变与评点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中认为南京图书馆藏本应为“吴观明本”,并与台湾天一出版社出版的“绿荫堂本”就眉评作了比较。而李金泉在《〈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若干版本问题考辨补》(第十届中国古代小说、戏曲文献与数字化研讨会,2011年)一文中指出,南京图书馆藏本应为“绿荫堂本”,而非刘文所言的“吴观明本”。此处,笔者赞同“李文”观点将南京图书馆藏本列入绿荫堂本。

[7]石昌渝:《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06页。

[8][日]湖南文山译、葛饰戴斗插画、落合清彦校订:《绘本通俗三国志》第1卷,东京:第三文明社,1982年,第7页。

[9][明]罗贯中:《三国演义》,[清]毛宗岗批评,孟昭连等校点,湖南:岳麓书社,2006年,第2页。

[10][18][19][21][23][明]罗贯中:《三国演义》,[明]李卓吾批评,宋效永等整理,安徽:黄山书社,1991年,第1、233、408、281-282、590-591页。

[13]笔者推测吉川《三国志》最初的报纸连载包括早期的文库本使用的是该“ ”字,之后的文库本(如1989年版)为规范用字将其改为“頭”字。

[14]王丽娜、杜维沫:《〈三国演义〉的外文译文》,《明清小说研究》2006年第4期。

[15]沈伯俊:《〈李笠翁批阅三国志〉简论》,《社会科学研究》1993年第5期。

[16][日]中川谕:《〈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林妙燕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49页。

[17]王米娜:《谈吉川英治〈三国志〉中的刘备形象》,《北方文学》2013年第8期。

[20][22]谢立群、张永:《论吉川英治〈三国志〉对〈三国演义〉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1年第12期。

[责任编辑:钟 和]